



利益算计
权力斗争

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，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的队伍，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。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去镇压，结果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就占领了全州，逼近汉城。朝鲜国王急了，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，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国求援，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。

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国和日本之间，但朝鲜已经摸索出一套

05

狡猾的日本人

两面讨好、左右逢源的方法，这边恭维一下大清国要点赏赐，那边勾搭一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。如果请清军来到朝鲜平叛，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，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。

袁世凯大人出面了，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国借兵，说是鼓动，其实是施压。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大清帝国求援，请求“上国立派天兵”。

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。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，因为这是维护“天朝上国”面子的绝佳机会。

但冷静下来考虑，还有一个问题：那就是还要顾忌日本人。

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，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，但是，大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吃了亏，当时大清国只想早点儿息事宁人，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（清日《天津条约》）。条约的主要内容是，如果将来朝鲜再发生动乱，两位大哥动手之前要互相通告一声，免得影响清、日交好。也就是说：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，清、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利。

可以看出，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在军事上被老袁压制，但在外交上占了很大的便宜，他们通过这个条约实际上废止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，把朝鲜推向了两国“共管”的境地，日本人在大清国

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。

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。不派兵吧，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，而且作为保护藩属国的“天朝上国”，当朝鲜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出兵，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；如果派兵吧，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，因为在大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，清、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，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

于是，领导指示袁世凯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。

袁世凯到了日本驻汉城公馆，向日本大使了解情况。日本大使告诉袁世凯：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了，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，多赚点钱，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！

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，这在很多书里都有过描述：袁世凯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，极力主张出兵，并说明日本大使杉村俊是他的哥们儿，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，即使大清国出兵，日本也不会派兵的，发电报时间是1894年6月2日。

袁世凯就这样轻易地“上了日本人的大当”。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，而是如何发动中日甲午战争。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

次上当受骗的情况，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，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、出入色情场所等。

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些书籍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，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，也要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。

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，经常缺乏的是“体制内思维”，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，我们经常把握不准，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。

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。

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（朝廷、国家等等）的思维，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，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——表面为集体，实际为个人。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。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封建官员，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儿，那就是：公私两便。

因为他们知道，天下为公，没有人愿意去干；完全为私，也干不长久。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，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，公就是公，私就是私，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。

袁世凯的想法就是要公私两便。
（摘自《大清灭亡启示录（1894—1911）》作者 黄治军）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1976年10月，中国发生了大事件，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。在上海的马路上，到处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，人们高举着彩旗，呼喊着口号，形成了欢乐的海洋。黄宗英兴冲冲回到家里，看见赵丹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，她感到十分惊异，问道：“阿丹，你怎么啦？”

///

赵丹最后的日子（一）

“阿丹，你……”
赵丹抬起了头，目光里燃烧着怒火：“他们不准我参加游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黄宗英不解地问。
“为什么？他们说我应该明白，可我偏偏不明白，不明白！”赵丹气得直喘粗气。
不久，上海电影制片厂揭批江青一伙的大字报解开了这个谜。有一张大字报上说：“赵丹和江青有私情，他们一同去新疆，赵青就是江青所生……”

谣言造得这样离奇，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！赵丹又好气又好笑，他对黄宗英说：“旧的冤案还没平反，新的冤案又加给我了！这些人要干什么？难道一定要把我阿丹置于死地吗？”

谣言总是谣言，事实终究是事实。
随着“清查”运动的深入，赵丹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。春天来临了！文艺的春天也来临了！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，赵丹再也闲不住了，他想导演《八一风暴》，又想演《闻一多》《残雪》……可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实现。后来，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《大河奔流》，特约赵丹扮演周恩来总理。于是，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了北京。

在《大河奔流》剧中，有关周总理的戏不多，可赵丹为了在银幕上塑造好周总理的形象，花了不少心血。样片拍出来时，不仅形似，而且神似，摄制组的演

职员都说赵丹演周总理演绝了。

可是，在影片正式开拍时，又不让赵丹扮演周总理了。赵丹简直气得要发疯了，他满腔怒火责问有关的负责人：“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，现在为什么又不让我演了？”他得到的回答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，让人啼笑皆非。后来，好心的同志把真实原因悄悄告诉了黄宗英，说是因为有人提出赵丹和江青的关系，说赵丹演总理不合适。赵丹沉默了，在痛苦的沉默中，他流泪了……

赵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演戏、演电影，从来没遇到过回戏的情况。现在，由于一个毫无边界的谣言，竟把赵丹的戏给回了。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，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比在牢房里受刑更使人感到痛苦和忧伤。

就在赵丹极其苦恼的时候，画家富华来了，他高兴地对赵丹说：“阿丹，咱们到柳州画画去吧，柳州市委书记黄云同志特别邀请你去。那儿气候好、景色好，你一定能画不少画。去吧……”

黄宗英一听也很高兴，说：“去吧，阿丹，我陪你一道去。”

赵丹看看富华，又看看黄宗英，点着头说：“去吧，咱们去吧！”

于是，黄宗英陪着赵丹到了柳州。在柳州住了40多天，阿丹竟作了两百多幅字画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我在柳州获得

了第二次艺术青春！”

如今，在柳州都乐风景区的岩石上刻着的4个大字——天下都乐，就是阿丹在怡宾楼写下的。

黄宗英和赵丹回到上海的时候，柳枝刚刚返青。赵丹整天在家里看书、画画。为了聊以自慰，他激愤地画了一幅雨中的白芍。只见那盛开的花朵，舒展着洁白的花瓣，像在憧憬，又像在沉思。风雨袭来，它是那样的迷茫，又是那样的倔强，仍吐露着自己的芬芳。然而，那花瓣上有不少雨珠在闪亮。不，也许是泪珠……

赵丹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诗：
一生多蹉跎，
老来复坎坷。
不羨大富贵，
泼墨写白芍。

从1980年4月起，赵丹就经常胃痛，黄宗英把赵丹送到医院检查。

阿丹住院以后，胃里没查出病来，可是他上腹部的疼痛加剧了，食欲越来越差，脸色也显得苍白。可阿丹还像没事儿一样，每天他不是修改书稿，就是画画、写字。医生叫他多休息，他也不听。医生查病房时告诉阿丹，准备进一步给他做全面检查，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。
（姜金城）

（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）